

文化织锦与文学机锋：克劳德·罗森教授的 18 世纪英国文学研究

The Interweaving of Cultural and Literary Criticism: Claude Rawson's Study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杜娟 (Du Juan)

内容摘要：克劳德·罗森教授的 18 世纪文学研究涉猎广泛，但无疑是从菲尔丁研究开始的。上个世纪 70 年代，他出版了《亨利·菲尔丁与受到挑战的奥古斯都理想》，把菲尔丁的创作放到 18 世纪早期整个文化环境中考察。这种文学的文化研究视角一直贯穿在罗森教授的论著中，形成了如同织锦般的精细严密的研究特色。与侧重文学外部研究的文化批评不同，罗森教授始终关注文本本身的特有风格。从菲尔丁机智明快、善于修辞的文风出发，他将“讽刺 (satire)”归为 18 世纪的文化征候之一，并在 90 年代转向了讽刺文学研究，特别是斯威夫特及英语诗歌研究的艺术表现样式。罗森教授对这一文学机锋的研究兴趣，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既看重文学本身的审美特质，又重视文学参与道德对话的文化功能。

关键词：克劳德·罗森；18 世纪英国文学；文化研究；讽刺

作者简介：杜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心、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学研究院，主要从事欧美小说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美国冷硬派侦探小说的伦理叙事研究”【项目批号：20BWW05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Title: The Interweaving of Cultural and Literary Criticism: Claude Rawson's Study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Abstract: Claude Rawson's wide-ranging studies of eigh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began with his studies on Henry Fielding. In the 1970s, he published *Henry Fielding and the Augustan Ideal Under Stress*, which placed Fielding's works in the context of the entire cultural milieu of the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Since then, this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literature has been woven throughout Rawson's academic research, forming a brilliant and rigorous brocade of criticism. However, unlike other cultural criticism based on the external study of literature, Rawson's criticism

always places literary texts as its centrality. Starting with the study on Fielding's quick-witted style and rhetoric, he categorized "satire" as one of the cultural signs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In the 1990s, Rawson turned to the study of satirical literature, specifically Jonathan Swift and the style of English poetry. Rawson's diverse interests explain his academic concerns on both the aesthetic qualities of literature and its cultural function of engagement in moral dialogue.

Keywords: Claude Rawso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cultural studies; satire

Author: Du Juan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nd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Hubei Center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specializing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fiction (Email: janeto131@163.com).

作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18世纪研究英国学会（BSES, British Society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前会长，克劳德·罗森教授的研究一直围绕18世纪英国文学展开。他是菲尔丁、斯威夫特等众多经典作家研究的专家，并编撰了多个权威批评史丛书。

从职业生涯上看，他一直是个活跃的学者。1971-1986年，罗森教授在英国考文垂的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任职，曾任英语系及比较文学研究系主任，也是《现代语言评论》（*Modern Language Review*）和《英语研究年鉴》（*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的联合编辑。1986-2014年，罗森教授在耶鲁大学任教，他也是耶鲁第一位梅纳德·麦克英语教授（Maynard Mack Professor），其间还担任了耶鲁大学博斯韦尔出版社的总编辑和主席。退休后，罗森教授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剑桥，也保持着不间断的写作热情。纵观罗森教授的18世纪英国文学研究，他基本承继了学院派的作家、作品研究与传统的文化有机论视野，对文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尤为关注；同时，罗森教授的文风思路严谨，语言雄辩有力，善于辩证考量，形成了如同织锦般的细密，又暗含机锋的学术风格。

—

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罗森教授在学界展露头角。他33岁时就完成了《亨利·菲尔丁：文学传略》（*Henry Fielding: Profiles in Literature*, 1968）这部评传式著作。70年代初，他先后写了《焦点：斯威夫特》（*Focus: Swift*, 1971）、《格列佛与温和读者：斯威夫特研究与我们的时代》（*Gulliver and the Gentle Reader: Studies in Swift and Our Time*, 1972）、《叶芝与英-爱文学研究：彼特·乌的研究》（*Yeats and Anglo-Irish Literature: Studies by Pe-*

ter Ure, 1973) 等。

他的研究兴趣很多,但首次得到学界认可和关注的是他的菲尔丁研究。罗森教授第一部产生了重要影响力的论著是1972年撰写出版的《亨利·菲尔丁与受到挑战的奥古斯都理想:“自然的死亡之舞”及其它研究》(*Henry Fielding and the Augustan Ideal under Stress—‘Nature’s Dance of Death’ and other Studies*),把菲尔丁的创作放到18世纪早期整个文化环境中考察。据韩加明教授的统计,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8本菲尔丁研究专著。在众多研究中,这本书独树一帜,“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是菲尔丁研究中的重要著作”(372)。总体上来说,罗森教授采用了一种文化观照策略,作家创作时对社会文化的顺应、反拨与暗讽是他尤其感兴趣的。这是一种文化有机论的视野。即文学家以自己的创作参与了文化建构,同时又在挑衅中寻求某种文化平衡。这种文学的文化研究视角一直贯穿在罗森教授的论著中。罗森教授也继续加强文化观照,1973年又编辑出版了《亨利·菲尔丁:批评选集》(*Henry Fielding: A Critical Anthology*),集合了18世纪到20世纪较有特色的菲尔丁批评论文。

在80年代,罗森教授对作家研究的兴趣暂歇,更致力于对18世纪整体文化版图的描绘。《混乱中的秩序:从斯威夫特到考珀的十八世纪文学研究》(*Order from Confusion Sprung: Stud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from Swift to Cowper*, 1985)和《讽刺与感伤:1660-1830年英国奥古斯都传统的重点》(*Satire and Sentiment 1660-1830: Stress Points in the English Augustan Tradition*, 1988)是他在80年代最为重要的两部论著。后者还于1994年在剑桥出版社再版。除此之外,罗森教授在该年代还是《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的定期撰稿人,就各种文学和文化话题撰写文章,并持续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和其他期刊撰稿。在罗森教授看来,如果失去对当时社会背景与文化内涵的精细把握,是无法对作家作品有深切理解的。罗森教授多次表示,文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认识和理解文学文本。也就是说,文学研究能否能深入,在于文化“织锦”够不够细密。如果只是简单地去社会背景寻找参照,对文化仅是一种浅表的理解。实际上,作家的文友交际、文坛风气都会对作品的生成造成影响,进而和作家自身的个人气质混杂,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

90年代,罗森教授参与了一系列剑桥指南丛书的编撰。他是《剑桥文学批评史》的总编辑之一(*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1995年首版)¹。在这套八卷本的丛书中,他与H.B.奈斯比特合作负责的是第四卷“18世纪”部分。《剑桥文学指南》丛书之一的《十八世纪英国小说》(John Richetti主编,1996年首版)中有12篇论文,其中《亨利·菲尔丁》这一篇

1 另两位主编分别是耶鲁大学的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 1925-2022)和剑桥大学的休·巴尔·奈斯比特(Hugh Barr Nisbet, 1940-2021)。

就是罗森教授执笔的。这篇论文读来很能见出教授的细密功夫。他并不是单一地观照作家作品，而是将之放在宏阔的文化背景以及文人交战的文坛氛围中来加以考察，去发掘作家的特异性特征。如说菲尔丁“在早期的小说家中，他是唯一一个出身贵族，也是唯一一个风格和文化忠实于我们有时称之为奥古斯都传统的人”(Rawson, "Henry Fielding" 120)。由于菲尔丁的主要小说，如《约瑟夫·安德鲁斯》(*Joseph Andrews*, 1742)、《汤姆·琼斯》(*Tom Jones*, 1749)、《阿米莉亚》(*Amelia*, 1751)等创作于18世纪四、五十年代，因此他通常被我们视为理查森和约翰逊的同时代人。但罗森教授提到，菲尔丁在创作早期曾用过一个“粗制滥造第二(Scriblerus Secundus)”的笔名，而蒲伯、斯威夫特、盖伊曾在18世纪初组建了一个名为“涂鸦社(Scriblerus Club)”的英国文学俱乐部，常常聚会嘲讽时政¹，因此这个名字很明显是模仿了蒲伯和斯威夫特的“涂鸦”文学集团(Scriblerian coterie)。菲尔丁其实参加了之前的奥古斯都时代(1700-约1750年)传统，同属于蒲伯和斯威夫特的讽刺家行列。菲尔丁在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 1726)出版两年后就开始了创作，而且几乎与蒲伯的《愚人史诗》(*The Dunciad*, 1728-1743)和格雷的《乞丐的歌剧》(*The Beggar's Opera*, 1728)抓住伦敦文学界的想象力同时，就开始了讽刺剧的创作。虽然因为戏剧审查法的出炉，菲尔丁由他擅长的政治剧创作转向了小说写作，但他依然不改以往的好战姿态，在文学先行者的传统中闯开一条新路。正因菲尔丁有很大的文学雄心，才会用“散文体喜剧史诗”(The Comic Epic in Prose)命名自己的散文虚构作品。他最早的两篇散文虚构作品——《莎梅拉》(*Shamela*, 1741)和《约瑟夫·安德鲁斯》——的创作则源起于他对理查森《帕梅拉》(*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 1740)的厌恶。罗森教授的描述精确概括了18世纪小说兴起时如火如荼又混乱有序的文学派别及其阵营，并将菲尔丁与同时期作家的联系和区别阐述得清楚明白。对此，韩加明评价说：“罗森为1996年出版的《剑桥18世纪小说指南》所撰写的菲尔丁一章，对菲尔丁的小说创作特点进行了很中肯精到的评价”(376)。

2007年是菲尔丁诞辰300周年，鉴于罗森教授在此方面的卓越贡献，出版社特别委托罗森教授编辑和撰写了两本书，分别是《亨利·菲尔丁剑桥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nry Fielding*, 2007)和《亨利·菲尔丁(1707-1754)：小说家、剧作家、记者、地方法官：双重纪念》(*Henry Fielding (1707-1754): Novelist, Playwright, Journalist, Magistrate: A Double Anniversary Tribute*, 2008)。前者汇集了当时英美学者的最新成果，其中的编年史和批评索引为学者们提供了研究指南。后者则以生平为线索，描述并分析了菲尔丁在戏剧、小说、新闻和政治方面的工作。该书不仅仅限于对菲尔

1 参见 马弦：“打造一个迟钝、污浊的新世界——《群愚史诗》对初现的英国现代社会的批判”，《外国文学评论》3(2011)：91。

丁生平梳理，还评价了菲尔丁对小说作为主要文学形式的兴起、法律的发展以及 18 世纪英国政治和文学文化的独特贡献。这两本批评合集是任何一个研究菲尔丁的学者都绕不开的权威批评著作，它们的出版也充分奠定了罗森教授在 18 世纪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二

正是由于他对 18 世纪文学 - 文化的精确理解，罗森教授几乎编撰了所有 18 世纪重要作家的作品选。尤其是 1986 年他在耶鲁大学任教后，赢得了创作编撰的井喷期，其编选集涉及多个作家，如蒲伯、斯威夫特、理查森等。事实上，仅在 80 年代这十年间，他就陆续编辑出版了《英语诗人剑桥读本》（*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Poets*, 1988）、《德莱顿、蒲伯、约翰逊与马龙：伟大的“莎士比亚群”》（*Dryden, Pope, Johnson, Malone: Great Shakespeareans*, 1988）、《墓园派诗人托马斯·帕内尔诗选》（*Collected Poems of Thomas Parnell*, 1989）等。

在阐释论证时，罗森教授始终秉持于细微处辨析的辩证意识，思路严密，不乏洞见。仍以菲尔丁研究为例，尽管菲尔丁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外观看似是奥古斯都时代传统的外延，但罗森教授同样注意到，菲尔丁的政治主张、个性特征却把他拉向了相反的方向。在《亨利·菲尔丁与受到挑战的奥古斯都理想：“自然的死亡之舞”及其它研究》一书中，罗森教授提出菲尔丁作品的“反奥古斯都倾向”（*Anti-Augustan tendency*）（Rawson, *Henry Fielding and the Augustan Ideal under Stress* 102）。他指出，菲尔丁的两部晚年作品（《阿米莉亚》和《里斯本之旅》）已经失去了在《约瑟夫·安德鲁斯》和《汤姆·琼斯》中可见的自信的绅士风度，自然秩序的确定感让位给对“奥古斯都文化形式的不稳定性”（9）的认识。面对不可预测的环境和人类的堕落，旧的“文雅的装备”被简化为“一种风格的遗迹（*the relic of a style*）”（62）。此外，罗森教授明智地认为《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The Life of Mr. Jonathan Wild the Great*）是在《约瑟夫·安德鲁斯》之前创作的，他评论的焦点集中于“奥古斯都秩序感的基本要素”，即“英雄理想及其在古代史诗中的体现”（95）。他指出，这部早期作品仍有菲尔丁自信风格化的迹象，最典型的就是对魏尔德这个邪恶人物的喜剧性淡化，从而“有意地改变”了讽刺作品的凄凉，“保持文雅、比例和权威控制感”（109）；但对漫画小说模式的期待并没有完全在书中实现，作品“在尖锐和有趣之间紧张地摇摆”（165）。更为尖锐的是，罗森教授指出，菲尔丁的仿拟运用暗示了对英雄理想本身的一些怀疑，这位臭名昭著的罪犯在菲尔丁的笔下不仅被喜剧式地“软化（*softened*）”，而且其英雄主义类型被颠覆性地赋予了“骄傲的自我实现（*proud self-realization*）”（217）。罗森教授在研究时始终用动态发展的视角考虑问题，抽丝剥茧，充分观察逻辑辩证

对立的方面，又将之统一于文本阐释之中，读来难以找到逻辑漏洞和论证瑕疵，颇让人信服。

罗森教授虽然从菲尔丁研究起家，但新世纪之后的后期研究已经明显转到斯威夫特上来。这种研究兴趣早在他编撰《英语诗人剑桥读本》时便见端倪。该书收录了29位诗人，而斯威夫特排在第11个。罗森教授在书里评述道：“斯威夫特写的诗几乎和蒲伯一样多（如果不包括后者翻译的荷马史诗的话）。斯威夫特在诗人中的声誉比在批评家中更高。他后世的崇拜者和模仿者包括拜伦、叶芝和艾略特”（Raws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Poets* 213）。在20-21世纪之交，罗森教授先是编撰了《斯威夫特：批评文选》（*Jonathan Swift: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1994），后来又写了《上帝、格列佛与种族灭绝》（*God, Gulliver, and Genocide: Barbarism and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1492-1945*, 2001）。尽管克里斯朵夫·福克斯教授在2003年刚出了《斯威夫特剑桥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nathan Swift*），罗森教授还是写了《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2004），并担任了《乔纳森·斯威夫特作品诺顿版》（*Norton Critical Editions: 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Jonathan Swift*, 2009）的总编辑。2010年出版的《斯威夫特时代的政治与文学》（*Politics and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Swift: English and Irish Perspectives*）是一本不容忽视的批评专著。这本书从英语和爱尔兰语境探讨了斯威夫特对异议人士的态度，他与首相沃尔波尔的关系，以及他在殖民地爱尔兰的政治人口统计学中的观点。这些丰富而重要的新论述显示了斯威夫特非凡的文学和政治成就，有助于我们理解斯威夫特在18世纪政治和文学文化中的中心地位。

这种研究转向，在笔者看来，与罗森教授既重视整体文化观照，又着力于文学本身的审美机制辨析相关。乔纳森·斯威夫特是当时英格兰和爱尔兰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评论家。他的诗歌和散文讽刺作品是18世纪历史学家的主要资料来源。在国外学界，罗森教授被称为“也许是18世纪讽刺文学，也许是英国讽刺文学本身在世的最好的学者”。而斯威夫特与菲尔丁相比，更适合做讽刺文学的研究对象。2011年春季，笔者曾有幸旁听过罗森教授开设的两门课：本科课程《讽刺（Satire）》和研究生课程《斯威夫特、蒲伯和他们的文学圈（Swift, Pope and Their Circle）》，庶几可以见出教授的研究偏好。在本科阶段，罗森教授注重学生们对文学手法的体察和学习，甚至是创作模仿，他让学生提交一篇校园讽刺作品作为成绩评定来源之一；在研究生阶段，教授更看重于同一文化圈内部作家的精细分辨，因此会讨论这些文人在18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政治上的交流。但无论是哪个课堂，比较辨析都是罗森教授的常见提问方式。他的追问多数是“what's the different of ... and ...?”他不会急着给学生评判，几乎所有的回答他都会肯定。但真正击中鹄的，他也会用“get the point”高兴地予以赞许。有意思的是，罗森教授虽然关注文人之间的交际与论战，却也不在乎文学高下之争。笔者还记得问过他觉得菲尔丁的文学成

就高还是理查森的文学成就高，他并不想置评，追问后才勉为其难地说理查森要好一点。现在想来，其实在罗森教授眼里，文学本就是一幅色彩斑斓的锦缎。正是深深浅浅的参差交错才构成了繁花景象，去问这个问题未免陷入我执了。

2014年荣休之后，罗森教授仍笔耕不辍。这段时间出版的两本书仍然与斯威夫特有关。分别是《斯威夫特的愤怒：斯威夫特、爱尔兰和种族悖论》（*Swift's Angers: Swift, Ireland and the Paradoxes of Ethnicity*, 2014）和《斯威夫特与其他》（*Swift and Others*, 2015）。在前本书中，罗森教授试图回答斯威夫特“愤怒”的本质特征。《斯威夫特与其他》则讨论了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文学影响，以及他的思想、个性和风格对英国奥古斯都传统的主要作家的渗透，包括他的朋友、崇拜者和竞争对手们。由于这些突出的研究成就，罗森教授也因此被视为“斯威夫特最具挑战性、最激动人心、最博学的现代评论家”。

三

也正是出于对文学与文化互动机制的关注，罗森教授尤其偏爱讽刺。在笔者看来，罗森教授的讽刺文学研究仍是从菲尔丁机智明快、善于修辞的文风开始的。尽管菲尔丁早年以政治讽刺剧开始踏入文坛，但如 F. R. 利维斯这类传统批评家大多认为菲尔丁的文学世界过于直白，不会将其视为修辞学者。利维斯展示了菲尔丁小说的“内部道德关注”，仍拒绝将《汤姆·琼斯》放入英语小说的“伟大的传统”之中便是证明（Paulson, “Introduction”）。与利维斯的判断不同，罗森教授格外重视菲尔丁讽刺修辞的文化动因。《亨利·菲尔丁与受到挑战的奥古斯都理想》这本书的基本理论前提是：罗森教授假设“作者需要通过丰富的反讽技巧来维护他对情境的情感控制”，并将菲尔丁的写作视为通过文体模式“将和谐秩序强加给残酷事实的努力（as the effort to impose harmonious order on brute fact）”（Rawson, *Henry Fielding and the Augustan Ideal under Stress* 234）。

威廉·燕卜逊精于语义批评，他也注意到了菲尔丁讽刺技巧下叙述立场的复杂性。燕卜逊认为，“菲尔丁是习惯的双重反讽者”（Empson 132）。叙述者看似矛盾的修辞（如有时赞扬汤姆·琼斯的行为，无论是否道德；有时又直接断言汤姆做了错事），其实是维持了一种讽刺疏离和同情理解的微妙平衡。罗森教授则表示：“（菲尔丁）的反语从本质上是修辞和心理学意义上的”（Rawson, *Henry Fielding and the Augustan Ideal under Stress* 9）。他在菲尔丁的作品中追溯了对“奥古斯都情感的本质（……）部分”的紧张迹象——摹仿“有秩序、有连贯性的（……）理想”，即自然。罗森教授的后期研究关注斯威夫特，也是因为斯威夫特冷静的讥讽中，有对世界的退避、漠然和反叛。

与其说“讽刺”是某些作家出于个体偏好选择的修辞技巧，还不如说由

于讽刺内在机制的诡谲多变，造就了文学和文化互动过程的复杂征候。罗森教授在某种程度上将“satire”视为文学的基本文类，对之展开了历史言说；并在《讽刺与感伤：1660-1830年英国奥古斯都传统的重点》一书中，认为其构成了一种文化征候。在大学本科课堂上，他将讽刺的文学传统上溯到古罗马的贺拉斯（Horace）与朱文纳（Juvenal）那里，历数了从古至今的英语讽刺作品，讲到的作家有多恩、德莱顿、约翰·威尔莫特·第二代罗切斯特伯爵（John Wilmot, 2nd earl of Rochester）、奥尔德姆（John Oldham）、斯威夫特、蒲伯、盖伊、菲尔丁、约翰逊、拜伦、雪莱、T.S.艾略特与奥登。尤其重点关注1660-1830年，这也是罗森教授在《讽刺与感伤》一书中的核心内容。在这一时期，讽刺由于整个时代文化对“感性（sensitivity）”或“情绪（sentiment）”的崇拜而软化，从一个不寻常的主导地位转移到一个相对温和的地位。这一转变与大规模的社会和文化变革有关，并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讽刺诡谲多变，既是一种文学类型，也是一种表现手法。在这门课的内容简介中，罗森教授一连用了六个问题引发学生的思考，不由令人叹为观止——讽刺是一种保守、寻求恢复旧美德的文类，还是一种进步的、带来新秩序的文类？它最典型的流行是存在于稳定、保守的文化中，还是在社会流动或革命的环境中？它的目的主要是侵略性的、惩罚性的还是改革性的？它在间接讽刺还是直接谴责中表现得更好？它的典型作用是作为一种缓和机制还是作为一种激进机制？讽刺有时是在讽刺自身吗？¹这一连串的发问也可以见出罗森教授对讽刺在语境压力下的多重意蕴把握。自从文学成为自觉虚构创作的产物，它必然存在于多元语境中，与之互为因果关系。因此，讽刺既出于作家-文本之间的文化应对（cultural impact），也是文本-读者之间社会集体意识的体现。罗森教授在《斯威夫特的愤怒》中的分析可见一斑。这本书分为“爱尔兰”“小说”“诗歌”三个部分。10章中有8章是之前著作或论文的重写版本，仅有爱尔兰种族的一章和关于凡妮莎和游记的一章是全新的内容。内容看上去散乱，但罗森教授雄辩地用“愤怒”的情感机制统领了全书，论述了斯威夫特对贺拉斯、朱文纳讽刺传统的文学回应和对当时政治评述的影响。而且，罗森教授又一次近乎诡辩地阐释了斯威夫特的“愤怒”与“反愤怒”。斯威夫特在作品中努力表达自己的敌意，同时也坚决地“保护”自己的“冷静”，关键是，他拒绝“抱怨（railing）”而不拒绝“愤怒（rage）”（Rawson, *Swift's Angers* 155）。对斯威夫特来说，嘲弄（raillery）“限定了愤怒的表现”，从而“促使愤怒得以释放”（156）。斯威夫特“敏锐地自我意识到”“他的性情与他所攻击的事物非常接近”（2）。在愤怒的伪装下，这也是作家自我暴露与自我保护的错综表现。讽刺造就了文学的紧张感，文本在现实文化挤压下的变形，不仅反映了创作者对情境的控制，也使得读者的阅读压力得以疏

1 参见 耶鲁大学英语系 2011 年春季本科课程 English 351B 的课程简介。

解。在文学 - 文化、创作 - 接受等多重角度的考量中，罗森教授获得了对于讽刺的深刻理解。

在克劳德·罗森教授眼中，再没有比讽刺（satire）更适合多元矛盾冲突的复杂体现了。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将之定义为一首谴责邪恶或愚蠢的诗（a poem in which wickedness or folly is censured）。¹就修辞技巧而论，它包括反语（irony）、挖苦（sarcasm）、滑稽（burlesque）、嘲弄（ridicule）、戏拟（parody）、漫画式夸张（caricature）等多种手法，尤其在当代政治和其他热门话题的背景下，用来揭露和批评人们的愚蠢或恶习，更显得意味深长。就文学风格而言，讽刺或尖锐或平滑，它既能义愤填膺、慷慨陈词，又能语带戏谑、暗含机锋；它有喜剧式的喧嚣与嘈杂，又带有一丝悲剧式的崇高和悲凉。罗森教授的研究偏好更在于后者：依靠言外之意和旁敲侧击，文辞的意义总会被语境的压力所扭曲，不相容成分的张力关系被合成一个整体。罗森教授对这一文学机锋的研究兴趣，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既看重文学本身的审美特质，又重视文学参与道德对话的文化功能。这也回应了罗森教授一贯的对奥古斯都文学传统的考察。“奥古斯都文学中的公共经验书写以社交性的对话为特点，不仅展现出党派政治的论辩，形成不同阵营的文学社区，同时也蕴含道德训诫，引领公共经验，强调秩序、规范与道德”（王欣 35）。讽刺的背后总是有一个道德训诫框架。它的意在言外既能捕捉日常生活的活力，批评社会政治的麻木虚伪，也能反思人类自身的缺陷与偏执。在讽刺这个多棱镜的映射下，社会文化与人类生活都充斥了迷人的复杂性，难以滑向某个极端单一的感情反应。

综上所述，克劳德·罗森教授博闻强记，始终以文学文本为核心研究对象，又能发散跳脱，辩证分析。他的 18 世纪英国文学研究主要立足于菲尔丁、斯威夫特两位作家的创作，在精耕之余又秉持文学有机论的考察视角，注重从文化背景着眼，钻研文学 - 文化的互动关系；并由此辐射到讽刺文学研究，偏好对其审美张力的考察。罗森教授退休时，耶鲁大学的同事将亚历山大·蒲伯的诗句送给了罗森教授，作为对他学者品质的肯定：品味严谨，但不受限制；/ 对书本和人类都了如指掌。²这正是蒲伯在《批评论》（*An Essay on Criticism*, 1711）中阐述的优秀评论家的特质。

Works Cited

Empson, William. *Using Biography*. Cambridge, M. A.: Harvard UP, 1985.

韩加明：《菲尔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 参见 <https://www.britannica.com/art/satire>, Written by Robert C. Elliott Fact-checked by The Editors of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Last Updated: Dec 28, 2023. Accessed 29 September 2024.

2 “Blest with a Taste exact, yet unconfin’d; A Knowledge both of Books and Humankind.” 参见 <https://fas.yale.edu/book/faculty-retirement-tributes-2014/claude-rawson>. Accessed 29 September 2024.

[Han Jiaming. *A Study of Henry Fielding*. Beijing: Peking UP, 2010.]

马弦：“打造一个迟钝、污浊的新世界——《群愚史诗》对初现的英国现代社会的批判”，《外国文学评论》3（2011）：91-104。

[Ma Xian. “A Critique of the Emerging Modern British Society in *The Dunciad*.”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3 (2011): 91-104.]

Paulson, Ronald, ed. *Fielding: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62.

Rawson, Claud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Poet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1.

—. “Henry Fielding.”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vel*, edited by John Richetti.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6. 120-152.

—. *Henry Fielding and the Augustan Ideal under Stress—‘Nature’s Dance of Death’ and other Studies*. London and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2.

—. *Swift’s Angers: Swift, Ireland and the Paradoxes of Ethnic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4.

王欣：“英国奥古斯都文学中的公共经验”，《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2020）：27-39。

[Wang Xin. “Public Experience in British Augustan Literature.”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2 (2020): 27-39.]